

文化融通视角下李大钊“民彝”思想新探

赵书昭,段立全,侯 佳

(华北理工大学 社科部,河北 唐山 063210)

摘要:文化融通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重要命题。1916 年,李大钊将中西方优秀文化因子有机结合,形成了他独特的“民彝”思想。事实上,“民彝”思想的产生也是他关于文化融通的初步尝试。1918 年,他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正式提出了文化融通的观点。在文化融通的理论视角下,“民彝”思想具备了自己崭新的特质,即浓厚的哲学意味和伦理内涵、永恒性和神圣性,以及衡量事理的功能和政治目标的至上性。

关键词:李大钊;“民彝”思想;文化融通;中西方优秀文化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8)04-0028-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8.04.005

A New Review on Li Dazhao's "Min Yi" Though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ZHAO Shu-zhao, DUAN Li-quan, HOU J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063210,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is the main tendency in human's cultural development,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in building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in the new era. In 1916, Li Dazhao put forward his special "Min-Yi" thought by combining the elements in splendid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ctually, the "Min Yi" thought was Li Dazhao's preliminary attempt for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in 1918, he formally presented his view on cultural integr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re are some unique characters in his "Min-Yi" thought, including the rich philosophical meaning and the ethical connotation, the immutability and the sacredness, and the priority in judging the logical function and the political objective.

Key Words: Li Dazhao; "Min-Yi" thought (ethical and moral standards); cultural integration; splendid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民彝》杂志是留日学生总会的会刊,李大钊担任主编,高一涵和邓初民等为主要撰稿人,一共发行了三期。1916 年,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作为发刊词发表在该刊的创刊号上。

基金项目:2017 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7MK023)

作者简介:赵书昭(1980—),男,河北乐亭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在此文中,李大钊提出了著名的“民彝”思想。“民彝”是李大钊早期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是中西方优秀文化结合下的思想产儿,也是李大钊对中西方优秀文化要素进行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如今,在文化融通的理论视角下,重新认识和解读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一、李大钊与文化融通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文化融通实践的先行者,而且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文化融通思想的杰出代表。在他提出文化融通观点之前,他已经将中西方优秀文化要素进行了有机结合,形成了其独特的“民彝”思想。十月革命之后,他在系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要素进行了尝试性结合。在《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中,他以中国古代象形文字的演变历史来透视人类生产方式的变迁,以证明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但需要说明的是,李大钊虽然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提出了文化融通的观点,但当时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国知识精英还远未建立起文化融通的理论体系。比如,关于文化融通包括哪些基本概念,文化融通“何以可能”以及“何以实现”等理论问题,李大钊并未能给出清晰的回答。当然,这并非是李大钊智识不足,而是由于整个中国思想界仍处于文化融通的理论不自觉状态,这显然是受到了时代和实践的局限。那么,理论层面的文化融通又应该如何理解呢?

(一)文化融通的相关概念阐释

关于文化融通问题,从“西学东渐”以来,实际上就已经是中国思想界不能回避的重要命题。所谓文化融通(也有学者称之为“文化会通”),包括文化契合、文化结合与文化融合等三个基本概念,也是支撑起文化融通理论结构的三大支柱。文化契合是指异质性文化之间的某种相似性或者通约性,是文化间共性的一种表征。文化契合是实现文化结合与文化融合的前提和基础。而文化结合则是在一定的方法和路径之下实现异质文化之间的连接与植入,以产

生新的文化生长点。文化融合则是在这些文化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成熟,最终形成新的文化成果。新的文化成果不仅具有旧有文化的优秀因子,更具有创新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对旧文化实现了超越与升华。总之,文化契合就是回答异质文化何以能够融通的问题,文化结合就是回答异质文化怎样才能实现融通的问题,文化融合则是回答异质文化融通的过程和效果的问题。

在文化交流史上,文化的冲突与碰撞总是首先被关注的,也表现得非常激烈和醒目。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之所以能够引发国际学界的关注,也源于这一点。但是,对于人类发展大势而言,文化的交流和融通才是真正的主流,才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终归宿。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一切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相融相通的杰出代表,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在对待文化融通问题上,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1]可见,从“西学东渐”以来,文化融通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纪性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永恒性的问题。

(二)李大钊的文化融通思想

李大钊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兼具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文化于一身的杰出人物。1918年,即“民彝”思想提出两年之后,他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中提出了文化融通思想,其基本观点是东西方文明互有长短,不可轻易厚此薄彼。他主张两种文明应该相互取长补短,调和互济,并认为人类文明的前途是东西文明调和下产生的“第三种文明”,即已经发生了十月革命的俄罗斯文明。最重要的是,李大钊没有对中华文明丧失信心,他坚信中华文明必将复兴,“为世界文明第二次之大贡献”。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既不同于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新文化派”的“西

化”思路,也不同于辜鸿铭、梁启超、杜亚泉和梁漱溟等“东方文化派”的“复古”思路,而是独具特色的“融合创新”思路。当然,正如梁漱溟先生指出的那样,李大钊并没有对东西方文化融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论证,基本是凭借一种直觉^[2]。这也表明了李大钊的文化融通思想并没有完全实现理论上的自觉。但是,在他的文化融通思想提出之前,他已然对中西方优秀文化的要素进行了有机结合,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民彝”思想,这种尝试具有开拓性意义。虽然“民彝”思想是李大钊在文化融通理论不自觉或者半自觉的状态下形成的,但并不妨碍我们采用文化融通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解读和再认识。

(三)旧词新意——“民彝”思想的文化结合路径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近百年的历史上,我党创造了诸多新的方式和路径以实现先进文化之间的结合与融合,包括“新词新意”“旧词新意”“旧表新里”“形易神驻”等路径(关于文化融通的相关概念和文化结合的路径另有专文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当然,文化融通的总原则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李大钊的“民彝”思想的创造虽然是在建党之前完成的,但其结合方式非常符合“旧词新意”的理路。

所谓“旧词新意”就是在重要概念的运用当中,一方面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成语、概念和典故,另一方面赋予其时代的新内涵、新意义。这样的例子很多,李大钊对“民彝”这一古老概念的创新和运用就是一例。实际上,当时“民彝”并不是一个新词,其出处为《尚书·康诰》中的“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之句^[3]。当然,李大钊一方面为“民彝”注入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比如民本思想、道家无为思想、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和而不同”等思想要素,另一方面更为“民彝”注入了西方近代文化当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民主自由精神和托尔斯泰的群众观思想。融合了中西方优秀文化因子的“民彝”思想,不仅以鲜活的、立体的、富

有时代生机和朝气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也成为了李大钊内心深处永不熄灭的理想火焰。

当然,诸如“旧词新意”的方法在我党历史上的案例也屡见不鲜。比如毛泽东同志对《汉书》中古语“实事求是”的创新和运用,邓小平同志对“小康”一词的创新和运用,江泽民同志对“与时俱进”一词的创新和运用,都是成功的案例。经过长期的发展,“实事求是”“小康”“与时俱进”这些词汇不仅融入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当中,而且也深入到了中国大众的精神生活,成为了中国人民街谈巷议、耳熟能详的词汇和话语,甚至达到了日用而不觉的境界,成为了中国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要素,这恰是文化深度融合的结果。

二、“民彝”思想中的中西优秀文化因子

“民彝”思想中既包括中国的民本思想,也包括道家 and 儒家的思想要素。关键是,李大钊赋予了“民彝”这个古老词汇以崭新的内涵,植入了西方近代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民主自由精神和托尔斯泰的群众观等内容,特别是托尔斯泰的群众观蕴含了人民史观的思想萌芽,为李大钊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铺垫了道路。

(一)“民彝”思想中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渊源

中国古代汉字中“彝”之本义是“宗庙常器也,彝本常器,故引申为彝常”^[4]。“民彝”是李大钊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中挖掘出来,并赋予了中西方优秀文化的精髓,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崭新概念和独特话语。虽然,“民彝”一词在李大钊的思想发展历程中似乎是昙花一现,但“民彝”之火在李大钊心中却从来未曾熄灭,直到他找到了心目中真正的“民彝”——共产主义。“民彝”思想中蕴含着大量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是李大钊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运用的生动案例。

1. “民彝”中的民本思想要素

《尚书·康诰》中有“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之语。所谓“彝”,就是“常”或者“常理”的意

思。《诗经·大雅·烝民》中有“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之语。也就是说,上天生养天下苍生,有万物有法则。天下庶民秉持常理,爱好和追求美德,特别强调了人民追求美德的价值取向。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中也引用了《尚书》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句,即上天也要尊重民意。《尚书》是夏商周三代时期的政府文告,当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因为,在夏商周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口的作用非常突出。人口的规模和质量是衡量国家力量的重要标志,统治者也比较理性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看到了人民在发展生产、繁衍人口、服兵役和徭役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出于巩固国家统治和强大国家力量的目的,统治者产生了“民本”或者“重民”思想,“民彝”无疑是以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为基础的。

2. “民彝”中的道家思想要素

“民彝”思想中蕴含了丰富的道家思想因素。道家最突出的思想就是守静无为,顺其自然。在李大钊看来,“民彝”包含了自治自理的功能,不应人为地干扰和破坏,应该“于牖育之余,守其无为之旨”^{[5]145}。所谓“牖育”的原意是诱导培养,指的是间接的引导和创造条件,而不是直接的干涉、包办或者统治。只有如此,人民才能做到“自踏其常,自择其宜,自观其成”^{[5]145},这是典型的无为而治思想。事实上,中国古代就有“王权不下县”的传统,广大乡村社会依靠乡约民规实行一种事实上的“自治”。同时,李大钊引用了《尚书·洪范》中的“彝伦攸叙”一语,指出“彝伦者,伦常也,又与夷通”^{[5]147},而《道德经》中讲“大道甚夷,而民好径”。他特别指出:“夷,平也。”“平”的意思即平坦,也可延伸为平常、平实、平易等。李大钊说:“为治之道不尚振奇幽远之理,但求平易近人,以布帛菽粟之常,与众共由。”^{[5]147}可以看出,李大钊所指的就是当时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封建专制统治就属于“振奇幽远之理”或者“非常之政术,非常之教令”,与“民彝”思想背道而驰。李大钊认为,“民彝”包含着道法自然的无为境界,与专制强权是尖锐对立

的。因为,“民彝”有自己不可侵犯的神圣领地。假如袁世凯复辟得逞,开历史的倒车,那么必将形成“越俎之害”,必将“侵犯民彝自由之域,荒却民彝自然之能”。

3. “民彝”中的儒家思想要素

“民彝”当中也含有丰富的儒家思想因子,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求同存异”及“和而不同”等文化内涵。对于损害和践踏“民彝”的劣行,李大钊深恶痛绝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痛斥反动政府肆意侵害“民彝”神圣领地、裹挟民众、绑架民众的劣迹。比如,专制统治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为人民的意志,用自己的好恶左右人民的好恶。李大钊尖锐地指出,专制统治者“己所好者,而欲人之同好,己所恶者,而欲人之同恶”。同时,反动统治者强行要求全社会、全体人民必须与其保持一致,“有诸己矣,而望人之同有,无诸己矣,而望人之同无”^{[5]147}。如果专制统治者一意孤行,擅权任性,放纵无度,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导致“别自太纷,争攘遂起”。这也反映了封建社会走向末期之时,儒家文化已经被严重异化,其传统的“忠恕”精神与“和而不同”等精神已经严重萎缩和缺失。相反,“民彝”思想由于和封建专制根本对立,因此自然包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求同存异”及“和而不同”等优秀思想要素。

(二)“民彝”思想中的西方优秀文化因子

1. 人文主义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所谓“民本”并不是统治者真正以人民为本,而是看到了人民对于其统治的重要性不得不加以重视。统治者对待人民更多采用的是“驭民”和“愚民”之术。因此,民本思想当中的“民”并没有真正地站立起来,也没有实现历史的自觉,正视自身的价值。李大钊将西方人文主义精神植入到“民彝”思想之中。他认为,“民彝”可以“烛照万物”,“如铸禹鼎,如燃温犀”,赋予了“民彝”神圣的地位。同时,李大钊看到了统治阶级思想对民彝的压抑和窒息,指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历代统治阶级正是利用孔子这样的圣人作为愚民和驭民的武器,使人民难以发现自我价值,匍匐于王权的脚

下。李大钊叹息道：“斯民秉彝之名，悉慑伏于圣智之下，典章之前，而罔敢自显。”^{[5]151}正是所谓的“圣智”和“典章”的长期压迫和禁锢，“人”和“人性”无法得到解放，自我意识不能实现觉醒，导致“民彝”被“荒于用”和“绌于能”。李大钊也指出孔子、孟子等先贤并非缺少“自我”“自重”之精神，也没有强迫人民“牺牲自我之权威”或者“低首下心而甘为傀儡”，他们的思想只是被统治阶级利用而已。所以，封建主义思想对人民的麻痹和毒害与中世纪欧洲神学的作用是一致的，为了反封建就必须赋予“民彝”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

2. 民主自由精神

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重要内容，是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果，对西方思想界影响深远。李大钊深受英国近代思想家密尔(1806—1873)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引用了密尔《自由论》中的大量观点。

首先，达到“善治”的代议政治才符合自由精神。李大钊以代议政治为切入点来谈论自由的价值。他引用密尔的观点，认为“善治”的基础就是国民要具有德与智这样的基本素养。他说：“惟一国政制组织是等善良资能之分量愈扩者，其组织之法乃愈善，其政治乃愈良。”^{[5]149-150}这说明李大钊高度认同密尔的观点，即民主政治能否达到“善治”是与国民的基本素质(德与智)紧密相关的，而德与智则属于“民彝”的范畴，是人民必备的素养。

其次，一人之自由不能妨害他人之自由。绝对的、无条件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任何自由都具有自己的范围和界限。一旦超出界限，自由的价值必定大打折扣。李大钊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此类意念自由，既为生民之秉彝，则其活动之范围，不至轶越乎本分，而加妨害于他人之自由以上。”所以，“民彝”当中的自由是相对的，只有在承认自由界限，在不越界的情况下才能充分享受自由。

再次，“民彝”思想中亦包括丰富的反专制和反权威的精神。“民彝”思想的提出是针对袁

世凯复辟的。袁世凯统治时期，动用政治权力压制新闻自由。1913年3月21日，袁世凯政府实行“新闻检查”制度，发布了限制新闻舆论自由的通令。1914年3月2日，袁世凯政府炮制了《治安警察条例》，禁止“秘密结社”和“同盟罢工”。可见，袁世凯时期思想专制和政治专制是并行的，极大地扼制了民主自由的空间，极大损害了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权利。李大钊对此痛斥道：“余思之，且重思之，则君主专制之祸耳。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5]163}事实上，传统文化当中含有大量优秀因子，但被封建统治者推向极致之后便出现了异化和扭曲，思想就会僵死，自由就会被窒息，“民彝”之光就会被遮蔽和淹没。所以，李大钊说：“为其历史所经阅者弥久，斯其圣哲所垂诏者弥多；其圣哲所垂诏者弥多，斯其民彝受翳蒙也弥厚。”^{[5]151}因此，“民彝”思想具有强烈的反权威特征。反权威并不是完全排斥权威，而是反对将某种思想理论或者个人推向绝对正确，将其置于不容质疑的地位。无论是基督教神学、儒学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于是才会有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解放思想。

3. 托尔斯泰的群众思想

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受到俄国思想家托尔斯泰关于英雄和群众思想的深刻影响，颠覆了李大钊以往的英雄史观，使他开始产生了人民史观的思想萌芽，为他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李大钊辩证地分析了英雄史观。英雄史观认为英雄豪杰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无视人民群众的历史性作用。当然，英雄史观虽然看到了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割裂了英雄与群众之间的联系，离开群众孤立地看待英雄的历史作用。当然，对于英雄的作用不能绝对化。李大钊指出，正是因为以前的历史上没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圣贤人物，所以才能成就这些圣贤伟大之功德。但是，一旦上述圣贤作为后世榜样，被推崇到极致，则圣贤将绝迹

于后世。

其次,李大钊认为应通过思想改造来破除英雄史观。英雄史观使人民丧失自我,形成对英雄的依赖,匍匐在英雄或者圣贤脚下,“民彝”不能够得到彰显。他说:“夫尊重史乘、崇奉圣哲之心既笃,依赖之性遂成于不知不识之间。”^{[5]155}因此,要破除英雄史观,必须从思想上进行根本的改造。但李大钊也看到了思想改造的难度。他引用王阳明的话说:“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民贼之巢穴,不在民军北指之幽燕,乃在吾人自己之神脑。”^{[5]155-156}所以说,对旧有思想的清算和扬弃是一个非常艰难和充满反复的过程。

再次,“民彝”蕴含了人民史观的思想萌芽。李大钊转引托尔斯泰的观点,即“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5]156}。也就是说,英雄并非是天赋的,所谓“英雄之势力,初无是物”。如果英雄不能够代表民意,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拥戴,也就不可能拥有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也就不能成就自己。所以,如果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无所谓英雄。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将英雄拉下了神坛。他认为英雄人物与普通人物之间并没有所谓的天壤之别。他说:“夫圣智之与凡民,其间知能相去不远。”也就是说,李大钊认为在认知能力方面,英雄与凡人差距本来不大,在根本属性方面,更是没有大的差别,所谓“秉彝之本,无甚悬殊也”。当然,李大钊并没有完全否定“英雄”的作用,而是认为无论是“英雄”还是“众庶”都具有自己的地位和角色,都是不可替代的。但“英雄”角色的发挥必须设有一定的界限,也就是英雄必须“以代众庶而行众意”,而绝对不可“背众庶以独行其意”。所谓民心不可违,历史上任何英雄豪杰如果违背民心,一意孤行,势必遭受失败的后果。同时,李大钊也看到在专制政治之下,国民是服事英雄的,立宪政治之下,国民是驱使英雄的,这也是两种政治制度的差别之一。虽然,李大钊当时还未完全看透西方的资产阶级立宪政治的本质,但他对于英雄与群众关系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展现出了一些人

民史观的思想萌芽,这为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铺垫了道路。

三、文化融合下的“民彝”思想新特质

“民彝”思想既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又超越于传统文化之上,既融入了西方人文主义、民主自由精神,又包含了人民史观的思想萌芽,但又不完全西方化。那么,在文化融通的理论视角下,我们可以发现“民彝”思想中具有的一些崭新特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浓厚的哲学意味和伦理内涵

首先,“民彝”思想具有浓厚的哲学意味。李大钊说:“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5]145}“道”和“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与西方哲学中的“抽象与具体”“共性与个性”“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等概念趋同。在王夫之那里,“道”与“器”已经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基本上等同于思维与存在。李大钊认为,“民彝”包含了“道”和“器”的双重属性,即“悬于智照则为形上之道,应于事物则为形下之器”。也就是说,“民彝”即可以作为内心坚守的法则和理念,也可以落实到实际当中,发挥“器”的实际作用。其次,李大钊赋予了“民彝”明确的伦理内涵,指出“民彝”的终极价值追求就是“止于至善”,这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同时又超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视野,赋予了“止于至善”这种政治伦理以人文主义的关怀。

(二)永恒性与神圣性

在古代话语中,与“民彝”相对应的是“宗彝”。“宗彝者,宗庙之常器也”,也就是中国古代供奉于宗庙内的各种礼器,以供国家在“冠、婚、丧、祭、征讨、聘盟、分封、赂献、旌功”等典礼活动之用。因此,“宗彝”代表着国家权力,代表着“君权天授”的神圣性。但是,李大钊认为,“宗彝”是中国古代政治上的神器,“民彝”则是当今政治上之神器。“民彝”比“宗彝”更加具有永恒性和神圣性。他认为:“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民彝不可迁也。”^{[5]146-147}因为,随着改朝换代,王者易姓,宗庙倾覆,那么

“宗彝”这种物化的东西也自然会发生变化。但是,“民彝”则包含有“民心”“民权”“民意”“民德”,而具有永恒性和神圣性,是不可被颠覆和遗弃的。

(三)衡量事理的功能和政治目标的至上性

首先,李大钊认为“民彝”具有衡量事理的内在功能。他认为“民彝”是“吾民衡量事理之器”,赋予了“民彝”衡量轻重、辨别真伪、甄别善恶的功能。“民彝”内在的宝贵品质如同“纯莹之智照,坚贞之操守”,无论客观环境如何纷扰,陈规陋习如何顽固,奸雄权谋如何狡诈,都不能干扰“民彝”衡量事理之器的内在功能。因此,无论怎样的“求治之道”和“论治之言”,都应该以“民彝”为纲领,作为治国理政的最高原则。一旦违背这一原则,就会远离治世,陷入乱世。

其次,李大钊将“民彝”作为至高的政治原则和奋斗目标。他说:“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5]148} 宪法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产物,最初用来限制君主和贵族权力,以维护资产阶级的权益。宪法政治亦被视为先进的政治制度。李大钊高度赞美了英国宪法政治,认为“英伦宪法”与“民彝”的共同之处就是“匪制造而成者,乃发育而成者也”^{[5]148}。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李大钊认为“民彝”是自然发育的结果,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而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这无疑赋予了“民彝”天然的合法性;二是李大钊认为“民彝”是原则性的东西,是“不文之典”,他反对用繁文缛节的条条框框将其固化和僵化,反对窒息“民彝”的精神,而应为其留有弹性空间。当然,李大钊并非临渊羡鱼者,仅仅崇尚他国的先进制度无异于画饼充饥,他的根本目的是追求中国的民主政治,激活中国的“民彝”,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最高奋斗目标。在他看来,

“民权自由之华”已经“苞蕾于神州之陆”。因此,李大钊呼吁国人将“民彝”作为内心信仰,排除阻碍“民彝”发展的障碍,然后以水滴石穿的毅力和耐心将“民彝”发扬光大,而这就是“吾民惟一之天职,吾侪惟一之主张也”^{[5]149}。

再次,“民彝”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民主政治。李大钊之所以推崇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在与封建专制相比较下而言的。严格地讲,李大钊对待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采取保留态度的。他说:“假定(代议政治)其不良、其当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较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绝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5]149} 可见,在李大钊心目中,最神圣的、具有政治目标至上性的是“民彝”而不是民主主义。两三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暴露了西方民主主义的真正本质,使李大钊对民主主义开始产生了质疑。但是,他思想深处的“民彝”之火并没有熄灭,直到后来他才发现社会主义制度才是“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的具体制度,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符合“民彝”本质精神的,因此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3.
- [2]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0.
- [3] 尚书正义[M]. 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541.
- [4] 许慎. 说文解字(下册)[M]. 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1151.
- [5]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李秀荣)